

不談毛澤東的中共革命史如何可能？

——評李金錚《重訪革命：中共「新革命史」的轉向，1921-1949》

• 毛 升



李金錚：《重訪革命：中共「新革命史」的轉向，1921-1949》（香港：開明書店，2021）。

在現代史研究領域，「新革命史」這一提法已逐漸為學界接受，甚至成為某種時髦。近年來中青年

學者所發表的相關論文，即使刊登在以「黨史研究」命名的期刊上，也多刻意貼上「新革命史」的標籤，意在與之前的研究相區隔。這一領域近年也取得了一些學術成果，並引起了國外學者的注意^①。「新革命史」的首倡者是南開大學歷史學院院長江學者特聘教授李金錚，長期研究近現代經濟社會史、鄉村史，1990年後轉向中共革命史研究。這種轉向應受到其在南開大學讀博士期間的導師魏宏運教授影響。

魏宏運以研究革命史著稱，較早將西方學術界治中國革命史的方法引入中國，開風氣之先。他於1984和1991年組織了兩屆研究抗日根據地的國際學術會議，邀請了周錫瑞 (Joseph W. Esherick)、塞爾登 (Mark Selden)、弗里德曼 (Edward Friedman)、范力沛 (Lyman P. Van Slyke)、戴瑞福 (Ralph Thaxton) 等西方研究中共的重要學者參加，並出版會議論文集^②。

「新革命史」的首倡者李金錚在《重訪革命》一書收錄十五篇論文，前三篇討論「新革命史」的理念與方法，其餘十二篇則是具體的個案研究。對於有興趣了解何謂「新革命史」、該如何研究「新革命史」的讀者來說，本書無疑是一個重要文本。

* 筆者感謝張志偉、陳鐵健、譚徐鋒、郭寧等師友及匿名評審人的批評指正，對本文的修改極有幫助，特此致謝。

李金錚無疑是在乃師的基礎上，試圖為革命史研究尋找新路，長期為此探索^③。最近，他將2006年後發表的相關代表性論文集集成冊，出版了《重訪革命：中共「新革命史」轉向，1921-1949》（引用只註頁碼）一書。書中收錄的十五篇論文，前三篇討論「新革命史」的理念與方法，其餘十二篇則是具體的個案研究。對於有興趣了解何謂「新革命史」、該如何研究「新革命史」的讀者來說，本書無疑是一個重要文本。

一 邊緣化還是內捲化？

在本書第一篇文章的開篇，李金錚就提出中共革命史與太平天國、義和團運動、辛亥革命等研究類似，「在學界都發生了由熱變冷的趨勢」，並為革命史研究的邊緣化現象憂心。他認為原因有三：一是長期以來的革命範式削弱了革命史的學術性；二是改革開放後「現代化範式」成為主流，學者不再關注革命，將興趣轉向現代化研究；三是著名學者李澤厚、劉再復1995年出版《告別革命：回望二十世紀中國》一書，提出「告別革命論」，削弱了革命研究的重要性（頁2）。本節將分析李金錚所謂中共革命史「由熱變冷」一說的可能由來，並說明該講法未必符合事實。

如果當年革命史曾經「熱」過，那是怎樣的一種革命史？那只是學者在執行政治任務，目的不為求真，而是服務現實政治。學者沒有選擇研究領域的自由，甚至觀點都不能偏離官方的主流論述。這類所

謂的革命史研究，在史料發掘上可能有所貢獻，在觀點創新上則乏善可陳。如果有些與官方論述不同、更符合史實的新觀點能被官方接受，常常並非因為真實戰勝了虛假，而是得到了黨內比較開明的高官支持，否則難逃被批判的厄運。如「富田事變」獲得官方一定程度的平反，固然有學者的貢獻，更因為得到了蕭克將軍的支持^④。而「西路軍問題」之所以得到徹底糾正，更是因為當事人陳雲、李先念位高權重，一言九鼎，指出「西路軍過河是黨中央為執行寧夏戰役計劃而決定，不能說是張國燾分裂路線的產物」^⑤。因此，即使這是一種所謂的「熱」，也與學術研究關係不大。

改革開放後，社會獲得了一定言論空間，黨史研究者開始逐漸擺脫官方的論調，根據史實重寫黨史，做翻案文章。毛澤東時代的黨史書寫以蘇聯的《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為藍本，不僅強調中共革命的正義性，且以此作為黨內路線鬥爭的工具。經過文化大革命的浩劫後，研究者希望撥亂反正，對中共歷史上的人物和事件有一個符合史實的評價。黎澍、李新、陳鐵健、林蘊暉、戴向青等前輩黨史研究者做了很多開拓性的工作，儘管研究領域還是以政治、軍事為主，但解放了很多學者的思想，示範效應不可低估^⑥。

隨着改革開放的深入，中國學者與西方中國研究學界的互動交流頻繁，現代化範式逐漸成為主流視角。學院派的革命史研究逐漸擺脫了1981年〈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論調，與中共

李金錚提出中共革命史與太平天國、義和團運動、辛亥革命等研究類似，在學界發生了由熱變冷的趨勢，並為革命史研究的邊緣化現象憂心。如果當年革命史曾經「熱」過，那是怎樣的一種革命史？

中央文獻研究室、各級黨校所代表的官方論述漸行漸遠，更富有學術特色。因此，革命的正當性、必然性不再天經地義，學者開始討論革命如何打斷了現代化的進程，反思包括延安整風運動在內的歷次黨內鬥爭中，革命如何吞噬了自己的孩子。楊奎松、高華、沈志華、曹樹基、蕭延中等1950年代出生的學者的研究，都是在現代化範式下所取得的成果。這些黨史著作出版不易，但市場上常是洛陽紙貴。楊奎松、沈志華的著作幾乎每一本都在不斷重印，高華的《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延安整風運動的來龍去脈》一書在2000年出版後，儘管盜版猖獗，但銷量已超過十萬冊^⑦，這能說邊緣化嗎？如果有學者繞開中共革命史，選擇其他研究課題，也不見得是因為革命史不重要，而是因為該領域學術自由度小，不容易發表成果罷了。

李澤厚與劉再復的對話集《告別革命》既沒有鼓吹放棄中共革命史研究，也沒有否定革命的道德正義性，只是不認為革命是當時唯一可以選擇的方案：在二十世紀，革命並非歷史的必然，改良亦是一種可能，歷史充滿「偶發性」(contingency)。因此，《告別革命》只是要告別那個「革命和政治壓倒一切、排斥一切、滲透一切，甚至主宰一切的世紀」，並非要告別革命史研究^⑧。李金錚似乎是誤讀了《告別革命》一書，認為該書讓讀者「情緒化地厭惡乃至反對革命史研究」(頁3)。

李金錚關於革命史研究已經邊緣化的判斷究竟從何而來呢？他用來支持自己觀點的文獻就是加州

大學聖地亞哥分校榮休教授周錫瑞頗有影響的〈把社會、經濟、政治放回二十世紀中國史〉一文(頁2，註釋1)。細讀該文，周錫瑞主要在批評文化史成為美國學界的主流研究範式，政治史、社會史被邊緣化的現象。他認為不理解政治、社會，光談文化，根本無法深入理解歷史。他最近出版的《意外的聖地：陝甘革命的起源》(*Accidental Holy Land: The Communist Revolution in Northwest China*)一書的〈中文版序〉中，亦明確表示美國學界「對中國革命的研究漸漸失去了關注」，轉向民國史和共和國史。然而，周錫瑞所談論的是西方(主要是美國)的中國研究學界，並非中國學界的狀況，不可簡單比附。正如周錫瑞所言，「美國沒有黨史研究，學者們視中共革命史為更宏闊的20世紀中國革命進程的一部分」^⑨。

自延安整風中以《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為藍本，利用編撰中共的「路線黨史」對政治對手進行歷史清算以來，黨史寫作一直是中共的新傳統，從未輕忽過。此外，黨史寫作已經建制化，也成為一個巨大的就業市場。不僅各大高校裏有馬克思主義學院、黨史專業、思政教育課程，在黨校、社會科學院等官方學術機構裏有黨史的教研室，還有數量不菲的專業學術期刊。但在西方，革命史只是中國近代史的一部分。現代化範式或文化史範式成為認識中國歷史的新方法後，革命史確實逐漸邊緣化。在中國，中共仍是唯一的執政黨，無論出於何種目的，對執政黨的興趣仍是人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如何會被邊緣化呢？除了官方的黨史生

李澤厚與劉再復的對話集《告別革命》既沒有鼓吹放棄中共革命史研究，也沒有否定革命的道德正義性，只是不認為革命是當時唯一可以選擇的方案。因此，《告別革命》並非要告別革命史研究。李金錚似乎是誤讀了該書。

李金錚所謂中共革命史被邊緣化的說法，應是在照搬周錫瑞的說法。只是該學科在中國存在明顯的「內捲化」(involution)現象，即投入研究的人力物力不斷增大，研究的邊際收益卻在下降，突破性的成果乏善可陳。

產，即使學術化的革命史研究，無論從該領域的從業人員數量、每年發表的學術成果，還是市場上相關圖書的銷量而言，從來未曾邊緣化。因此，李金錚所謂中共革命史被邊緣化的說法，應是在照搬周錫瑞的說法。只是該學科在中國存在明顯的「內捲化」(involution)現象，即投入研究的人力物力不斷增大，研究的邊際收益卻在下降，突破性的成果乏善可陳^⑩。2006年東京大學教授石川禎浩《中國共產黨成立史》中文譯本初版時曾引起學界轟動^⑪，中共革命史領域中的突破性成果，不是由數量龐大的中國黨史研究者取得，而是出自日本學者之手，值得中文學界反思。

二 新革命史「新」在哪裏？

李金錚出版論文集的目的，應該是試圖比較系統地釐清何謂「新革命史」，究竟「新」在何處。他給出的定義是：「『新革命史』是回歸樸素的實事求是精神，力圖改進傳統革命史觀的簡單思維模式，嘗試使用新的理念和方法，對中共革命史進行重新審視，以揭示中共革命的艱難、曲折與複雜性，進而提出一套符合革命史實際的概念和理論。」(頁25)在本書封面選用紅字標出了「新革命史」的所謂「核心」：「強調回歸實事求是的史學軌道，提倡以常識、常情、常理和新的理念和方法來研究革命史，將革命史對象化、歷史化、學術化。」然而，李金錚提出的「新革命史」的一些特點，即使在深受現實政治影

響的黨史研究領域，也很難說是「新」的。比如實事求是，以史實為根據，不弄虛作假；以常識看待革命，勿將其變為迷思，亦不應將革命過程簡單化；努力將革命史研究學術化，成為歷史學科的一部分，而不是意識形態化，成為獲取統治合法性的宣傳材料。在這些方面，無論陳鐵健、林蘊暉、唐寶林等前輩學者，還是比他們年輕的楊奎松、高華、沈志華等人，雖然沒有聲稱自己做的是「新革命史」，但一直都在這些方向上努力，並各自以扎實的、開拓性的成果奠定了革命史研究學術化的基礎。何「新」之有呢？

其實，李金錚所推崇的「新革命史」與前輩學人最大的差異，即在研究視角上，這才是新意所在。本書的前三篇論文〈向「新革命史」轉型：中共革命史研究方法的反思與突破〉、〈再議「新革命史」的理念與方法〉、〈「新革命史」：由來、理念及實踐〉，試圖闡釋他所謂的「新革命史轉向」，提出了五個新視角：

第一個是「運用國家與社會互動關係的視角」，強調既要注意政府自上而下的形塑，也要注意來自社會的自下而上的互動。李金錚認為傳統革命史觀存在所謂的「政策—效果」模式，即「中共政權的政策演變，農民接受並獲得利益，最終是革命鬥爭、革命建設積極性的提高」(頁27)。在作者看來，這一模式是一種勝利者的視角，卻將複雜的革命過程簡單化了。他認為中共政權和中國社會之間存在複雜的互動關係，中共動員民眾參加革命，並非一蹴而就，而是充滿艱

辛。農民並非如提線木偶般一拉就動，怎麼拉怎麼動。他們即使選擇跟隨中共，亦經過了長期的接觸與了解，其中的猶豫、掙扎和痛苦不可忽略。因此李金錚認為，「國家與社會互動關係」的視角可以克服「政策—效果」模式的局限，更好地認識革命的複雜性。

第二個是基層或民眾視角，這其實與前一個視角有關聯。「政策—效果」模式之所以一度成為革命史研究的普遍研究方法，就是研究者忽視了社會/民眾的主體性。人是複雜的動物，有自己的獨立性和訴求。在政府與社會的互動中，政府並不能總是按照自己的意願，隨心所欲地形塑社會，必須根據社會的回應調整策略。因此，雙方之間的互動是一場永無止境的談判，儘管政府通常是強勢一方。李金錚認為，研究中共黨史要「強調基層社會和普通民眾的主體性」，用從下往上的角度來關照歷史的過程（頁31）。

第三個視角則是強調革命史與鄉村史相結合。李金錚認為中共革命是一場鄉村革命，但之前的革命史研究卻對鄉村史缺乏深入考察，從而無法對中共革命的歷史進程作出合理解釋。因此他建議，「應將中國革命史納入到大鄉村史的視野來考察」，將革命史與鄉村史這兩個不同的領域結合起來（頁33-34）。李金錚長期研究鄉村史，且頗有建樹，這一建議應該是他長期研究所獲得的心得體會，也是他的長處。

革命不僅是一個中國現象，更是一個全球現象。作者認為，除了討論中共革命與共產國際及蘇聯關係的少量學術成果，傳統革命史觀

缺乏對於世界其他國家和地區革命的了解和研究，中外革命的比較研究也相當缺乏。因為不了解其他國家的革命，學者只能就中國談中國。如此，既難以看到中共革命在世界革命史上的重要性，也忽略了與其他革命之間的聯繫與差異。因此，作者提出了第四個視角，建議「從全球史視野考察中國革命」：不僅要考察中國革命與其他國家和地區的聯繫，彼此如何影響，還要通過中外革命的比較，找出中共革命的特色以及世界價值（頁36-38）。

文中進而提出要「開拓新的研究視角」，即第五個視角，作者羅列了一系列關鍵詞，如「話語、符號、象徵、形象、想像、認同、身份、記憶、心態、時間、空間、儀式、生態、日常生活、慣習、節日、身體、服飾、影響、閱讀」等新名詞（頁38-39），鼓勵將這些新視角引入中共革命史研究中，並提出各種結合的可能性。比如將環境史的視角引入革命史研究，考察環境如何制約了革命的策略與行為，而革命反過來又如何影響了環境。再比如將日常生活史（*history of everyday life*）引入根據地研究，探討根據地內不同群體的日常生活如何受到政治、經濟及軍事的影響。作者認為，士兵的日常生活尤其值得關注。畢竟根據地是一個高度軍事化的區域，士兵是主體。但以往學者的注意力都集中在高層將領身上，普通士兵的衣食住行、情感欲望等私人生活領域卻長期被忽視（頁38-40）。

通過羅列以上五個新視角，我們其實不難發現李金錚所推崇的「新革命史」，就是學習美國史學界在實現社會史、文化史、全球史轉

李金錚所推崇的「新革命史」，就是學習美國史學界在實現社會史、文化史、全球史轉向後的革命史研究，考察中國革命的社會與文化層面的歷史，寫一部不談毛澤東的中共革命史，即不總是以革命領袖為主要研究對象，而是將其作為研究革命的政治背景。

在西方學界，中共革命史的研究逐漸走出極權主義視角，主張中共革命是一場因地制宜的地方革命，不可簡單化約，應將其地域化，多做根據地研究。愈來愈多學者努力將革命放回社會脈絡中。

向後的革命史研究，考察中國革命的社會與文化層面的歷史，將最新的西方史學潮流引入中共革命史研究中，並將其本土化。「新革命史」不再只是研究精英政治，而是將革命地域化，多關注基層、普通人、社會與文化層面，勾勒革命的複雜過程，寫一部不談毛澤東的中共革命史。所謂「不談」，即不總是以革命領袖為主要研究對象，而是將其作為研究革命的政治背景。李金錚在書中用來支持自己觀點的文獻，大部分都是前文提到的抗日根據地國際學術會議論文集中周錫瑞、塞爾登、戴瑞福等人的文章，而不是與會中國學者的文章，從中自然可以看出他的學術取向所在。楊奎松、高華、沈志華等人的革命史研究對象主要還是政治、外交這類精英政治，關注的是毛澤東、周恩來等高層政治人物的作為，中共大政方針的出台過程，歷次政治運動等，對基層社會關注不多，更遑論與後現代史學結合。用李金錚的說法，「凸顯了政治、黨派、主義、階級和革命史本身，而忽略了其他面相」（頁25）。因此，革命的社會與文化面向相信就是「新革命史」的新意所在。

自1950年代以來，闡釋毛澤東領導的以農民為主體的共產革命及其興起，成為美國中國研究的熱點。當時學界所接受的理論，是阿倫特(Hannah Arendt)基於納粹德國的經驗所提出的極權主義理論，即在極權主義統治下，民眾並不認可政權統治的合法性，只是迫於高壓統治，不敢反抗而已。根據該理論，共產革命在中國之所以能

夠成功並得以維持統治，端賴暴力、陰謀和洗腦。經歷越南戰爭的失敗後，美國人對民主社會的完美想像逐漸瓦解，對於美國能否改變非西方國家，使其變成美國那樣的民主國家也產生了懷疑。同時，1960年代開始的民權運動，讓少數族裔的權利開始得到關注，身份政治興起。在共產革命研究領域，強調社會具有相對自主性的「修正主義」學派開始逐漸替代極權主義學派，鼓吹身份政治的社會史逐漸取代政治史，成為史學的重要分支。

在西方學界，中共革命史的研究早在1960年代即逐漸走出極權主義視角，開始尋找中共成功的原因，標誌性的著作就是詹鶴(Chalmers A. Johnson)的《農民民族主義和共產主義政權：革命中國的浮現，1937-1945》(*Peasant Nationalism and Communist Power: The Emergence of Revolutionary China, 1937-1945*)一書，作者提出中共的成功有其社會基礎，即有效利用抗戰時期農民群體所產生的民族主義^②。其他學者還提出，中共在延安所推行的政治、經濟政策，列寧黨的強大組織能力，日本侵華帶給瀕臨絕境的中共生機等，都是中共打敗國民黨的原因。之後，學界更是認為以上的「單一原因論」(monocausal explanation)不能解釋中共何以成功，要了解其成功之道就要拋棄「大理論」(如極權主義理論)，並主張中共革命是一場因地制宜的地方革命，不可簡單化約，應將其地域化，多做根據地研究。革命是一個過程，人們做出何種決

定，與其說是基於革命理念，不如說是在此過程中對於無法脫身的社會關係和無力控制的最新形勢做出的直接回應。因此，中共革命是一場因人而異的革命，要將人物放入社會背景、生活環境中加以理解^⑬。逐漸地，愈來愈多學者努力將革命放回社會脈絡中，尋找多種影響革命的因素，試圖寫一部「革命的人類學」。

李金錚提出的「新革命史」五個新角度，借鑒了西方中國革命史研究的方法，但不足之處是分類標準不清，如文化史、全球史的研究取徑即已包含了民眾視角。對於西方研究的一些解釋，也有望文生義之嫌，如將中共革命史與其他國家的革命史加以比較，認為這種跨國比較亦是全球史視角，但這也許可以稱為比較史學，甚至世界史，而並非今天西方學界正流行的全球史——全球史的主要目的還是試圖將研究對象放入與其有關的全球語境中，考察一個地方性的事件如何被全球背景所形塑^⑭。

三 如何研究「新革命史」？

李金錚論文集餘下的十二篇文章都是個案研究。如此鋪排，應該是在談完理論之後，再以實例示人研究「新革命史」的門徑。文章長度參差不齊，有的僅短至四頁，有的長達四十頁。以下試以其中篇幅較長、較有代表性的文章為例，討論其中的特色與得失。

〈抗日根據地的「關係」史研究〉一文提出應該關注中共根據地之間的關係，及其與國統區、淪陷區甚

至外國之間的關係。李金錚特別強調應該研究中共中央與地方根據地的關係，即「央地關係」；央地之間並非只是控制與被控制的關係，地方根據地有一定的獨立性，在經濟方面尤其明顯，有些決策（如「減租減息」措施）在華北抗日根據地比起中央所在的陝甘寧邊區更早實行。換而言之，地方的創造有上升為中央決策的可能。李金錚的這一觀察挑戰了我們對於中共作為一個列寧式政黨的刻板印象，之前研究往往認為中央對地方具有絕對的控制權，地方只是在執行中央的命令而已。文章提醒我們，這種看法並不符合史實。

共產革命為何成功？學者認為有多種原因，但中共成功地籠絡了農民是其中的一個重要原因。中共何以做到這一點？李金錚的研究筆記〈農民何以支持與參加中共革命？〉就建議學者要從農民的角度來分析^⑮。官方權威的說法指出，中共之所以獲得農民的支持，是因為中國當時土地分配不均，而中共實行了土地改革，農民因此獲得了土地，於是支持革命。然而，這一說法近年來受到質疑。愈來愈多的學者認為，農民參與共產革命與土改的關係不大，地域不同，原因各異；即使同一地方的農民，也各有各的動機。除了獲得土地這一原因外，還有因家境極度貧困而將革命視為一種出路、中共實行的社會經濟改革廣受支持、民族主義情緒的高漲、中共動員的有效性等。本文不僅評述了西方學者如霍夫海因茨（Roy Hofheiz）、黃宗智、周錫瑞、胡素珊（Suzanne Pepper）、塞爾登等人提出的新解釋，也評述了陳永

李金錚提出的「新革命史」五個新角度，借鑒了西方中國革命史研究的方法，但不足之處是分類標準不清，如文化史、全球史的研究取徑即已包含了民眾視角。對於西方研究的一些解釋，也有望文生義之嫌。

既有的解釋認為，農民因土改翻身而參軍，但李金錚指出，只是分地並不足以動員如此多的農民參軍。李金錚將追逐利益的行為解釋為農民文化程度偏低，不像知識份子覺悟較高所致，這亦是一種精英的偏見。

發、王奇生、黃道炫、黃琨等中國學者的不同說法，並提出了作者本人對此問題的認識。

〈土地改革中的農民心態：以1937-1949年的華北鄉村為中心〉一文更是進一步分析農民在土改中的心態。李金錚指出，農民對於土改並非只是支持，而是有着複雜的情緒，從一開始「不敢鬥爭的怯懦」，經過中共動員後開始產生「被剝削」的憤慨心態、有了「將地主打翻在地的復仇心態」、要求「絕對平等主義心態」，還出現因為怕被運動清算而形成的「越窮越光榮」心態。這篇文章不僅揭示了農民心態受到傳統文化的深刻影響，也指出了土改後農民心態發生了重大的變化，甚至走向了另一個極端。

〈「理」「利」「力」：農民參軍與中共土地改革之關係考(1946-1949)〉則是考察農民為甚麼參軍的另一篇力作。既有的解釋認為，農民因土改翻身而參軍，但李金錚指出，只是分地並不足以動員如此多的農民參軍。相反，有了地之後，有的農民希望在家種地，更不願當兵。中共採取了其他措施，才得以成功動員。土改後，中共在農民中鼓吹報恩思想，並告訴農民只有參軍以打倒國民黨，才能保護土改的成果，這就是所謂「理」的部分。有的農民則是為了謀取個人或家庭利益而參軍，如為了取得優撫，索要土地、房子、錢糧、衣服等而參軍，即為「利」。對於不願參軍的農民，中共地方幹部為了完成擴軍的硬任務，無所不用其極，強迫農民參軍，這就是所謂「力」的部分。李金錚因此得出結論，土改與農民的

行動之間的關係是複雜的。文章從農民的角度，豐富了我們對農民參軍動機的理解，極有新意。然而，李金錚在文中卻提出，「尤其是文化程度普遍偏低的農民，其態度和行為更多出自私利，而不像一些知識份子對社會和政治有自己的認識和追求」(頁160)，不是將追逐利益的行為視為人性使然，而是解釋為農民文化程度偏低，不像知識份子覺悟較高所致，這亦是一種精英的偏見。由此可見，要從民眾、底層的角度看待革命，轉換視角其實很不容易。

除了從農民的角度重新解釋民眾與革命的關係，〈讀者與報紙、黨政軍的連動：《晉察冀日報》的閱讀史〉則從讀者的角度，討論一份黨報究竟有多大的影響力。該文討論了《晉察冀日報》的讀者群、讀者獲取報紙的渠道、閱讀報紙的方法，讀者讀報後的反應等方面。新聞史往往只是從報紙發行者的角度來談報紙的創刊、採訪、編輯、發行的歷史，很少從受眾的角度去考察報紙如何被閱讀，到底產生了多大的影響^⑩。李金錚將源於西方的閱讀史與革命史結合，寫出一篇富有新意的論文。閱讀史傾向於強調讀者的能動性、獨立性，但李金錚在肯定讀者的自主性外，強調黨報對於讀者的巨大影響也不可忽視，這是他試圖與西方學界對話的一種努力，值得肯定。通過該文章，我們對黨報讀者的閱讀行為有更多了解，但還是無法知道讀者的閱讀行為和黨報的影響力能否變成革命行動，兩者恐怕也並非能夠輕易轉化，還需要別的因素加以催化。

除了民間視角，本書中的文章也試圖勾勒革命與傳統之間、中共與根據地、解放區鄉村社會之間的複雜關係。中國歷史上一直存在民間借貸行為，歷代政府都試圖出台政策加以規範，尤其要限制高利貸利率。〈革命策略與傳統制約：中共民間借貸政策新解〉考察了1937至1949年華北抗日根據地、解放區中共所實行的民間借貸政策。一開始中共對民間借貸採取激進的政策，高利貸固然得以抑制，卻造成農民無處借貸的問題，經濟生活難以繼續運作。最後，中共只好跟傳統妥協，兩次調整政策以穩定農民生活。

另一個中共與傳統妥協的例子是〈衝突與和解：一九四八年沂蒙解放區的抗旱救災與祈雨事件〉一文中所分析的祈雨個案。1948年夏，沂蒙地區久旱不雨，出現嚴重災情。中共地方政府採取了各種救災措施，抗旱效果還是不如人意。當地農民便轉而用祈雨這一民間傳統方式，乞靈於老天爺。大部分幹部將農民的祈雨行為視作封建迷信，試圖加以阻止，然而農民並不輕易妥協，與幹部的對立情緒也愈來愈激烈，甚至出現圍攻區政府的事件。中共在處理衝突時並未採取強硬措施，沒有過度斥責群眾祈雨和毆打幹部的行為，而是表明政府體諒群眾的苦衷，要求地方幹部自我檢討，最後用「壞份子挑唆」為藉口，將黨群之間的衝突轉化為階級矛盾，化解了一場危機。

這兩篇論文讓我們看到革命並非與傳統徹底對立，有時必須與傳統妥協，甚至還要利用傳統。同

時，中共的政策所產生的效果並非總是與官方所期待的一致，有時會出現意想不到的負面效果，政策也因此不得不持續調整，「黨一國」並非說了就算，還是要與社會不斷地談判。因此，我們在研究中不得不呈現政策變化的過程及其效果。同時，中共在面對傳統力量的抵抗時有時態度柔軟，並非一味訴諸暴力，也讓我們思考極權主義理論的適用性。

四 「新革命史」如何可能？

「新革命史」由李金錚首倡，本書可謂其數十年來研究心得的成果彙集，但獲得學界同行呼應後，「新革命史」的內涵已不斷擴充，逐漸泛化。即使書中獲李金錚提名可以歸入「新革命史」行列的學者，其研究也未必採取李金錚所倡導的新視角。近年來清華大學社會科學學院教授應星亦在倡導「新革命史」，並有精彩的研究論文發表，但其研究方法是將歷史學與社會學結合，試圖找出能夠解釋中共革命的本土概念。顯然，應星的研究與李金錚所倡導的「新革命史」存在明顯差異，或稱為「歷史社會學」更貼切^①。李金錚似乎也樂見「新革命史」的泛化，甚至認為一切將革命史學術化的努力都是「新革命史」。如此泛化的定義，恐怕有成為學術口號之嫌。

然而，革命史學術化的努力，最大的困難還是在於如何處理好學術研究與現實政治環境的關係。就

應星的研究與李金錚所倡導的「新革命史」存在明顯差異，或稱為「歷史社會學」更貼切。李金錚似乎也樂見「新革命史」的泛化，甚至認為一切將革命史學術化的努力都是「新革命史」。

革命史學術化的努力，最大的困難還是在於如何處理好學術研究與現實政治環境的關係。試圖寫出革命過程之複雜性的「新革命史」與現實政治要求「宜粗不宜細」之間的張力還會長期存在，將革命研究學術化的道路仍是曲折多舛。

像之前的革命史研究在政治上不時遭遇阻礙一樣，「新革命史」儘管常有學術術語的包裝，不像黨史翻案文章那樣直接挑戰官方權威，但其研究和出版也是禁忌多多。李金錚顯然也深受困擾，不得不在書中多次聲明，揭示中共革命過程的複雜性並非要否定革命，而是強調中共獲得勝利之不易，更加證明中共之偉大(頁10、21、26、53)。同時，他也認為，即使政府要利用革命史為現實服務，也應該利用事實的歷史，否則只會淪為宣傳說教，難以取得成效(頁53)。

然而，鄧小平早在黨內起草〈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時即指出，「對歷史問題，還是要粗一點、概括一點，不要搞得太細」，從而使黨內和民間「認識得到一致，歷史上重大問題的議論到此基本結束」^⑧。因此，試圖寫出革命過程之複雜性的「新革命史」與現實政治要求「宜粗不宜細」之間的張力還會長期存在，將革命研究學術化的道路仍是曲折多舛。在筆者看來，開放檔案、鼓勵學者做學術研究、讓革命史學術化，無疑有助於提升中國的軟實力。當中共革命的史實隱而不彰時，儘管官方有一套正面論述，坊間流傳更廣的常是捕風捉影的軼聞、低俗無聊的戲說，那才是真正的「歷史虛無主義」。

註釋

① 比如牛津大學資深研究員史密斯(Stephen Smith)教授一直關注「新革命史」，他曾囑筆者，如有新研究成果問世，當及時告知。

② 南開大學歷史系編：《中國抗日根據地史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集》(北京：檔案出版社，1985)；南開大學歷史系、中國近現代教研室編：《中外學者論抗日根據地——南開大學第二屆中國抗日根據地史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集》(北京：檔案出版社，1993)。

③ 魏宏運：〈讀書與治學：李金錚教授學術研究散評〉，《歷史教學》，2016年第18期，頁65-68。

④ 韓鋼：〈中共歷史研究的若干難點問題〉，載《夢想與路徑：1911-2011百年文粹》(北京：商務印書館，2021)，頁1361-1400。

⑤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陳雲年譜》，修訂本，下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5)，頁325。

⑥ 陳鐵健：〈中國現代史研究的歷史回顧〉，《近代史研究》，1991年第3期，頁12-24；韓鋼：〈中共歷史研究的若干難點熱點問題〉(上、下)，《晚霞》，2007年第4期，頁36-42、第6期，頁37-43。

⑦ 〈《紅太陽怎樣升起》英譯高華名著獲獎〉，《亞洲週刊》，2020年第8期，www.yzzk.com/article/details/新聞眼/2020-08/1582168004737/；〈《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英譯高華名著獲獎〉：www.asianstudies.org/aas-2020-prizes/。

⑧ 李澤厚、劉再復：《告別革命：回望二十世紀中國》(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2015)，頁2、60。

⑨ 周錫瑞(Joseph W. Esherick)：〈中文版序〉，載周錫瑞著，石岩譯：《意外的聖地：陝甘革命的起源》(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21)，頁xiii。

⑩ 美籍史學家黃宗智較早運用「內捲化」概念來分析中國的小農經濟。所謂「內捲」，即在人多地少的情況下，農民為了生存，對單位土地的勞動投入愈來愈高，邊際回報則愈來愈少，從而形成某種封閉的體系，排斥了可能的

改進創新。該術語最近進入公共話語空間，用來指代社會上存在的自我重複、鮮有進步的現象。參見黃宗智：《華北的小農經濟與社會變遷》（北京：中華書局，2000），頁6；〈小農經濟理論與「內捲化」及「去內捲化」〉，《開放時代》，2020年第4期，頁126-39。

⑩ 石川禎浩認為，對於中共成立過程中的每一個事件都應經過仔細考證，不可輕信已有的「定論」。他為此運用了日、漢、俄、英、德、法等多語種文獻，進行了仔細甄別，推翻了很多既有的陳說，獲得了重要發現。《中國共產黨成立史》中文版出版以後，得到包括中共研究專家李丹陽、陳永發等人的高度評價，但也遭到黨媒《光明日報》「高壓式的批判」。此書出版後很快售罄，成為中共研究的一本必讀書，再版則因出版管制變嚴而無法成事。2021年，該書修訂版終於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出版，成為紀念中共建黨一百周年的重要學術著作。參見石川禎浩：〈增訂版序〉，載石川禎浩著，袁廣泉、瞿艷丹譯：《中國共產黨成立史》，增訂版（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21），頁xii、xxi。

⑪ Chalmers A. Johnson, *Peasant Nationalism and Communist Power: The Emergence of Revolutionary China, 1937-1945*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2).

⑫ 參見Tony Saich and Hans van de Ven, eds., *New Perspectives on the Chinese Communist Revolution* (New York: M. E. Sharpe, 1995), xiv; R. Keith Schoppa, *Blood Road: The Mystery of Shen Dingyi in Revolutionary China*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5); 陳耀煌：〈從中央到地方：三十年來西方中共農村革命史研究述評〉，《中央研究

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68期（2010年6月），頁143-80。

⑬ Sebastian Conrad, *What Is Global Histor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6), 10-11.

⑭ 陳永發指出，華中地區的共產革命之所以取得成功，實因農民被成功操控。參見Yung-fa Chen, *Making Revolution: The Communist Movement in Eastern and Central China, 1937-1945*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6)。因此，李金錚在該文標題中使用「支持」一詞，似乎過度強調了農民參與革命的主動程度。然而，李金錚鼓勵學者敢於質疑權威說法，提出不同解釋，積極與外國學者對話的精神，顯然是一種可取的態度，畢竟學術研究要有進步，不可閉門造車，學者之間要積極對話。

⑮ 以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教授方漢奇為代表的新聞史研究即採此一研究取徑，代表作為三卷本的《中國新聞事業通史》（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2）。

⑯ 應星：〈新革命史：問題與方法〉，《婦女研究論叢》，2017年第5期，頁5-8。

⑰ 鄧小平：〈對起草《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意見〉（1980年3月至1981年6月），載中共中央文獻編輯委員會編：《鄧小平文選（1975-1982年）》，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頁292、294。陳雲亦對鄧所提的「〈決議〉宜粗不宜細」表示同意。參見陳雲：〈對起草《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幾點意見〉（1981年3月），載《陳雲文選》，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頁283。